

# 论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的改革问题

聂珍钊

**内容摘要：**目前的用于外国文学课程的教材有三种不同价值取向，一是尽量使教材的名称与课程名称一致，即外国文学。二是按地域的不同把外国的文学分为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或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两部分。三是根据教材的风格特点把教材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外国文学”，另一类称为“外国文学史”。前者在教材结构上普遍采用概述加代表作家加代表作品的三一模式，在作家研究上采用突出介绍重点作家、突出介绍重点作家的代表作品和突出对代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分析的三突出模式。教材的改革关键在于更新外国文学史就是教材的观念，需要分清外国文学教材与参考书之间的区别。实际上，真正的外国文学教材应该是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有诗歌、小说和戏剧三种形式。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 外国文学课程 教材 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聂珍钊，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兼任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主要学术专著有《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英语诗歌形式导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等。

## 一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外国的科学、社会学和文学书籍被不断翻译进中国，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且促进了中国的革命与进步。外国文学的翻译同中国的科技进步、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紧密相联，并在中国科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充当了催化剂，起到了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催生了高校外国文学课程。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作人在北大讲授外国文学课程的《欧洲文学史》。1930年，R.D.詹姆斯（R.D. Jameson）在清华大学西语系开设外国文学课程并出版了《欧洲文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我国的外国文学的大学课程如果从1918年算起，其历史已逾9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课程在我国高校进一步得到重视，外国文学不仅是我国高校中文系七大基础课程之一，也是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

就世界文学而言，外国文学无论就其思想内容、艺术形式或人文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文化宝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正是这种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外国文学课程在高校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

与此相适应的是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快速发展。以上世纪60年代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为代表，迄今为止我国有关外国文学课程的教材已不下数十种，形成了不同体系、不同风格的中国外国文学教材现状。在我们为外国文学教材的繁荣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繁荣下存在的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些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怎样给教材定义，教材与讲义、参考资料、教学大纲的区别与联系，外国文学教材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作为外国文学如何建构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教材体系，外国文学内容的选取原则，外国文学教材与教学的关系，外国文学的教学方法，等等。总的来说，我国

编写的外国文学课程的教材较多，但是对外国文学教材的研究较少。面对不断发展的外国文学现实和对外国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目前的外国文学教材似乎显露出种种不足与缺憾。这是我们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需要高度重视的。

在我国中文系课程设置中，外国文学是其中的七大主干课程之一，在中文专业大学本科生的知识结构中地位重要。但是，目前外国文学课程还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有关外国文学教材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如供大学本科阶段外国文学课程使用的教材应该如何编写，如何讲授，授课教师的教学和本科生的学习应该达到什么目标等，都是急需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高等教育中，教材既是教师教学的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课本。在不同的学科中，教师都需要根据各学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以实现教学目标。在一门学科的学习过程中，或是一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材不仅是位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重要环节，而且还是教师实施教学和学生学习知识的基础。因此，如何选取教材直接关系到教师对教学内容选择、组织与讲授，关系到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整体把握、学习与运用，关系到课程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学者指出：“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看，教材是联结教学与科研的纽带。通过教材把科研成果反映到教学中去，使教学与科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新的科研成果，会更新、充实教材内容，内容先进的教材又会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有些教材，特别是质量较高的专著，实际上标志着我国在某一学科领域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对我国文化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广义上说，教材指的是在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其它类型的学校）中供学生学习的著作，在内容上有严格的规定性，即它只是同某一学科有关。也就是说，教材在使用范围上是对针对学校的，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教材。《辞海》中有关教材的定义说：“教材是根据教学大纲和实际需要，为师生教学运用而编写的材料。”教材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学生通过学习教材可以掌握一门学科的专门知识，并通过这门知识从事某项工作或达到某个目标。教材不同于百科全书，它不对多个学科的知识进行全面介绍，而只是限于对某一学科的知识进行系统介绍。教材传授基本的、规范的、标准的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它不要求对某些具体学术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但要求对学科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综合、归纳，系统地对基础知识进行介绍。教材对学生说既是学习某一学科知识的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是学习某一学科知识的参考书。有学者指出：“教材除了用来讲授以外，还是主要的自学工具。”因此教材不仅要为学生提供某一学科的规范和标准知识，也要为学生提供系统和完备的知识信息供学生查阅和参考。教材需要反映学科的最新成果，但不得提供虚假的或不真实的证据、材料或是存在争议的结论。教材一般要同某一学科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一致，而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的修订或重写，往往也导致教材的重写，以便教材符合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由于学科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知识不断更新，因此，教材需要不断修订、补充和重写，以保持教材的更新和学科的发展同步。一本教材要反映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避免教材内容陈旧。

外国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中文专业的七门主干课程之一，是大学本科阶段知识结构的基本组成之一。作为高等学校的一门重要课程，外国文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外国文学是相对于本国文学而言的，指的是除了中国文学以外的所有他国文学。

---

李堃：《教材建设与管理》，国防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6页。

李堃：《教材建设与管理》，国防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4页。

在我国也有少数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史的教材，由于世界文学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在内，而中国文学的庞大内容又很难反映在教材中，这类教材大多只能对中国文学浅尝辄止。把外国文学史写成世界文学史是没有必要的，它只是出于一种贪大求全的企图，缺少科学的基础。仅仅就外国文学而言，已经很难在一卷或数卷教材中从整体上把外国的文学历史系统地反映出来，如果要加上中国文学史，这就大大超出了教材可能容纳的范围。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中简单地介绍中国文学的某些方面或部分内容，有可能因精简大量内容而破坏中国文学的整体结构，不能传授中国文学的系统知识。世界文学史中的中国文学内容只是重复了中国文学史中的部分内容，它无法取代中国文学史。因此，在目前条件下要写出真正的世界文学史事实上是不可能办到的。西方也有类似的世界文学史，如约翰·麦西（John Macy）写作的《世界文学简史》（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1927），它也企图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学包括中国的文学都纳入一书之中，但其结果只是介绍了世界文学的一鳞半爪，不得全貌，很难取得成功。因此，用世界文学取代外国文学的尝试证明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外国文学史的领域中去，不要去争夺中国文学史的领地，因为专治中国文学史的专家们比写作世界文学史的人更能耕耘好这块土地。

既然外国文学指的是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文学，从理论上说，外国文学课程应该是有关中国以外的所有外国的文学，外国文学教材也应该包括所有外国的文学并给学生讲授。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外国文学课程及外国文学使用的教材，只涉及到中国以外的部分国家，即部分外国的文学。在这部分外国文学中，西方文学以欧美文学为主，东方文学以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为主，而对其它国家的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很少的。

因此，外国文学课程的界定与使用的教材名称与外国文学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即目前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实际上指的只是部分外国的文学，学生学习的也只是部分外国的文学。外国文学由于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文学，由于这些国家的文学历史有长有短，文学的成就有大有小，加上语言的限制，有些国家的文学介绍到我国较多，有些国家的文学介绍到我国较少，从而造成外国文学信息在我国的不均衡。这种客观事实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甚至将来还会存在。因此，我国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史即包括所有或大多数外国的文学在内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目前我国高校使用的外国文学课程教材在名称上往往是不同的，如外国文学、欧美文学、西方文学、亚非文学、东方文学、外国文学史、欧美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亚非文学史、东方文学史等，也有称之为世界文学的教材。这些不同的名称表现出教材撰写者的三种不同价值取向。一种是尽量使教材的名称与课程名称一致，即外国文学。这是我国目前大多数教材的名称。第二种是按地域的不同把外国的文学分为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或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两部分。教材使用这种名称的企图在于尽量使教材的内容与教材的名称一致。

第三种价值取向是根据教材的风格特点把教材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外国文学”，另一类称为“外国文学史”。这两类教材的不同主要在于前者强调文学的批评和学术性，教材普遍采用的模式大多为三一模式，即一个概述，一个代表作家，一部代表作品。这类教材往往在一定时代的前提下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文学，例如讲到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时，首先是概述，即对这一时期整体文学的一般性介绍，并列举出后面将要重点介绍的重要作家。其次，在概述之后选择一个重要作家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阶段的文学的代表予以

介绍。最后，在介绍代表作家时又重点介绍这个作家的一部代表作品。同三一模式相联的是三突出模式，即介绍作家时突出对重点作家介绍，介绍重点作家时突出对该作家的重点作品介绍，介绍重点作品时突出对作品的主要人物介绍。对重点作家介绍的基本模式为作家的生平介绍、创作道路及重点作品分析。在介绍重点作家时，分析重点作品是其中最重要的。因此，这类教材的写作模式实际上就是三突出模式，即在教材中突出介绍重点作家、突出介绍重点作家的代表作品，突出对代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分析。由于这类教材以介绍重点作家为目的，因此介绍的作家相对较少。就目前我国高校使用的外国文学教材而论，大多数教材采用了一三模式。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这种教材体例的理由是可以缩小篇幅和方便讲授，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有些教材往往类似于讲义或讲稿。显然，这一类教材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另一类教材是以叙述文学史为特征的教材。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对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事件作出解释，是历史学家的目的之一”，那么对过去和现在的文学事件作出解释，则是文学史任务。这类文学史教材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文学的发展史，尽可能较为详细地介绍文学史上应该介绍的作家及文学现象，尽可能多地提供文学史上的有用材料，并给予客观地评价。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类教材，尽量把史的线索和作家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在提供全面系统的文学史知识的同时，也尽量对重要作家和作品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这类教材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既能为学生提供较为系统完整的专业知识，提供文学史的丰富信息，也能突出重点，引导学习者对文学史上的重点给予较多的关注，在对重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方面还能更多调动教师和学生更大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然，这类教材同前面提到的“外国文学”类教材相比有突出的优点。

英国学者理查兹在他的《课程研究导论》中指出：“在学校中学习的各门学科和提供的各种活动是基于某种目的的。就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提供这些东西是因为人们确信，这些学科和活动将服务于一些有价值的目的并很可能以此来达到预期的和渴望达到的结果。”课程有明确的目的，因此教材也有明确的目的。我很同意杨周翰先生关于教材的观点，即教材有两个功用，一是供学习和阅读，二是供查阅和参考。对于大学生的学习而言，外国文学教材同教师的讲授是完全不同的。教材应该是供阅读和查阅参考的工具书，因此教材必需遵循四个原则，即内容的丰富性（学生需要获得和了解的知识可以通过学习和查阅教材得到）、事实的准确性（教材所涉及的事实不得有误）、表述的客观性（教材与学术研究著作有所不同，不能把存在争议的观点写成学术界的共识）、以及历史的延续性（教材应该与历史保持同步，把最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历史写进教材）。随着时间的流逝，众多的文学不断变为历史，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对教材进行更新和补充，随时将新的学术发现和事实确认写进教材，做到与时俱进。

因此，我认为我国目前高校使用的教材应该以文学史为好，应该放弃过去在一三模式下撰写的高校外国文学教材的写作思路。一三模式的缺陷主要有三：1、由于强调突出重点，因此有较多的重要作家和重要的文学现象只是在概述里一笔带过，而没有必需的阐述。这样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用被强调的文学现象代替对全部文学的理解。2、不利于学生建构

---

【美】菲利普·巴格比夏克：《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李天纲 陈江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51页。

【英】菲利浦·泰勒和科林·理查兹：《课程研究导论》（王伟廉 高佩译），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页。

完整的外国文学的知识结构。对于高校中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在他们的整体知识结构中，外国文学的知识结构也应该是完整的，如果只强调某些重点作家而忽视其他重要的文学或文学现象，其结果将是导致外国文学知识结构的完整，进而影响学生在学业上的进一步发展。3、不能完全发挥教材参考书的功能。教材不仅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参考书和工具书，而且对于外国文学的自学者和爱好者来说，也是重要的学习参考书和指导书，对于那些地处边远地区和资料缺少的人来说，教材的参考和指导功能尤其重要。4、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分析和理解的能力。由于教材中对某些重要作品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容易导致学生把教材中的分析和理解误认为是唯一的，而实际上教材中的分析只能是撰写者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又由于篇幅的限制，教材中的分析也无法真正像论文一样展开，只是一般性的分析。尤其是对那些存在分歧的作家和作品，学习者是以教材的理解为主还是以专门的研究为主呢？这就成了一个问题。5、三一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讲义类型，不利于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在教材和教师的关系中，教材主要是供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参考的。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自己对课程的理解选择自己的授课内容和方式。因此，教材中突出的某些重点应该是教师的任务，而不是教材的任务。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入分析，应该由授课教师同学习者一起去完成。这是教材无法也不必要去完成的任务。尽管按照三一模式写作的教材也有其可取的一面，但是它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 二

以上主要讨论的是目前我国高校使用的外国文学教材体例和编写方法等方面的问题，除此而外，我国有关外国文学教材的观念也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总体而言，在现有观念中，外国文学教材指的就是由教师编写的供学生学习外国文学课程的外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史著作，即对外国文学发展历史进行叙述的著作。因此，按照现有的教材观念，目前我国高校普遍使用的《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欧美文学》、《西方文学》、《东方文学》、《亚非文学》等著作，就是我国高校学习外国文学的教材。目前我国编写教材、讲授课程等，都遵循着这种观念，然而这种观念存在重大缺陷。

关于外国文学教材的观念，首先有几个基本概念需要弄清楚。一是关于外国文学教材的概念。外国文学教材指的是供学习外国文学课程使用的学习用书。二是关于外国文学课程的概念。外国文学课程指的是学习外国文学的课程，即这个课程的设置是用来学习外国文学的。三是关于外国文学的概念。外国文学指的是由外国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诗歌、小说和戏剧三种形式。因此，学习外国文学的课程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学习外国文学作品的课程。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喜剧、巴尔扎克的小说等，都是外国文学课程的基本内容。

既然外国文学就是外国文学作品，教材是学习外国文学的用书，因此教材就是外国文学作品。试想，如果学习莎士比亚的戏剧而不学习《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等具体的戏剧文本，能够算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学习吗？显然不能。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莎士比亚戏剧的具体文本，才能用作莎士比亚的学习教材。如果学习荒诞派戏剧，只有贝克特《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才能是学习的教材。如果学习托尔斯泰的小说，只有《安娜·卡列里娜》、《复活》才能是学习的教材。现在大学的文学课堂，学生不阅读文学作品，或用阅读文学史著作代替阅读文学作品原著，在很大程度上者是我们错误的教材观念导致的。

关于原著本身才是教材的观念，古往今来，历来如此。中国古代的正规教育始于西周，以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为基本教育内容。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继承了周朝的教育传统，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因此孔子用于教学的最早的教科书至少有经他编订的《诗经》、《礼记》、《乐经》、《尚书》和《春秋》五部。《周易》的《传》解释卦辞、爻辞，七种文字共十篇，传说为孔子所做，因此也是孔子用来教学的教科书。孔子编订的是周朝时代的人编辑的教学用书，因此在他编订之前，这些书实际上是在教学实践中已经使用的教材。自孔子以后，“四书”和“五经”（“乐经”失传）共9部书就成为在中国教育中长期使用的教材。（五经指《易》《尚书》《诗》《礼》《春秋》5部儒家经典；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4部书的合称）。四书中的《论语》成书于孔子之后，是他的学生写的“回忆录”，即“孔子语录”，主要记载孔子讲学的言行思想，因此《论语》可以看成我国教育史上最早的一部讲义。但是中国的儒学到了清代，由于官场腐败，科场舞弊，学风败落，于是“儒学浸衰”，“官学积渐废弛”，封建学校的教育一片萧条。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封建教育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甚至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私塾仍然存在。鸦片战争前后，在西方文化和枪炮的双重进攻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改革旧教育，学习西学，开始语言革命，废除科举制度，我国教育模式在西方教育的影响下发生变革，新的教材开始进入新式学堂。

西方最早的教学活动始于古代希腊。早在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Hesiod, 740-670 B.C.）出于道德说教目的而写作的《工作与时日》，可以在广义上看成是欧洲最早的教材。从希腊的古典时期开始，希腊的教育开始发展起来，“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著作、“伊索寓言”等当时已经成书的作品，都被用作教材。公元前6世纪左右，萨福在莱斯沃斯岛上创办女子学校，教授诗歌、音乐、仪态等，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她使用什么教材，但她既然教授诗歌，那么就少不了要阅读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在奴隶制繁荣时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柏拉图在公元前386年创办了“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亚里斯多德在公元前335年创办了“吕克昂”（Lyceum）哲学学校。柏拉图在长达40年的执教生涯中，以对话体形式写作的重要著作《理想国》、《会饮》、《斐得若》、《费多》等，实际上都是他为讲学撰写的讲义。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讲学中使用了从荷马到悲剧作家的作品作为学生阅读的教材。一直到19世纪，用于西方文学的教材仍然是历史上的经典性作品以及文学选集。

从教材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教材最初只是教师指定的供学生学习某门课程的阅读材料，大多由历史上的重要经典构成。学生通过阅读和学习指定的典籍，加上教师的解说和阐释，学生则可以获得某一课程的专门知识，从而实现教学的目标。文学课程的教材也是如此，最初都是阅读和学习文学作品，教师的授课就是讲解文学作品。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学校，文学课程中学生学习的主要文本材料仍然是文学作品。然而到了今天的中国，外国文学课程使用的教材，却逐渐与文学作品脱离开来，异化为介绍和讲解文学的文学史。实际上，现在所谓的教材，就是孔子、柏拉图等学者当时用于教学的讲义，同用作教材的文学作品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目前有关外国文学教材的改革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更新我们现在的教材观念，回到文学作品这个原点上来。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教材和用于学习教材的参考书

---

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06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11-3116页。

之间的区别，认识教材和用于讲解教材的讲义之间的区别，认识阅读文学作品同阅读讲义之间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好外国文学这门课程。

我们强调用作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使用的外国文学史或讲授外国文学的著作就没有价值。不过，它们的价值只是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外国文学作品，同真正的外国文学的教材是不同的。就西方文学而论，历史的沉淀形成了大量的文学经典。时至今日，文学历史上的作家和作品已经不计其数，并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大量的文学经典。我们不仅无法读完历史上所有重要的经典作品，而且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甚至难以判断出哪些是我们应该阅读和学习的作品，或者说，我们无法轻易地做出判断，哪些文学作品可以用作学习文学的教材。因此，文学史著作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外国文学教材的改革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教材观念的改变以及如何理解教材、讲义和教学参考书等问题，而且关系到我们教学质量的提高，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培养出合格的本科毕业生。因此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十分紧迫。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有关外国文学教材改革的讨论中来，共同讨论如何构建外国文学的课程，正确理解外国文学课程的教材，探讨讲授外国文学课程的方法。我们相信，有大家的共同参与，就能推动外国文学课程的改革，加强外国文学教材的建设，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